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

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编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

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李荣松

封面设计：蒋仲文

抗 战 时 期 的 大 后 方 经 济

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警成都指挥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13.13字数：284千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前 言

1987年是抗日战争爆发40周年。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于1987年5月末，在四川大学召开了《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学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东北、华东、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文史单位的学者、教授、专家共60余人，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大后方的工业、交通、贸易和农业等部门的开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向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有不少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应各方面的要求，特精选了部分文章，编辑成《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专辑，作为1988年12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的第二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敬请社会各方面人士指正。同时，谨向发起召开《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学学术讨论会》的有关单位和为讨论会提供论文及出席讨论会的同志、向四川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8年3月

ISBN7-5614-0202-8/F·20 定价：3.85元

目 录

略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的性 质	姜 铎(1)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 济研究的几个问题	孔经纬(15)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 的战略调整	韩渝辉(20)
论抗战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的一些特点	姜建华 陈凤珍(39)
论抗战时期的自贡盐业生产	凌耀伦(46)
抗战时期的四川工厂联合 会	罗继成 李本哲(69)
论四川近代钢铁工业的演变	陈昌智(84)

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方经济
的影响

迁渝工矿企业在战时后方工业
经济中的地位 and 影响

抗战时期企业迁湘概况及对湖
南经济发展之影响

略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工业建设

抗战时期的四川农业

试论民生公司的统一川江航业

抗战时期的西南公路交通

抗战时期西南商业概况

抗战时期重庆对外贸易

(译文) 刘景修 周 勇(225)

抗战时期西南对外贸易概述 黄 泓(239)

抗战时期的西南财政刍议 王大龙(254)

简介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 项安才(278)

试论抗战时期的田赋征

陆仰渊(107)

张策佳(116)

傅志明(133)

蒋致洁(142)

彭通湖(155)

熊 甯(172)

郭晓泉(194)

周显理(209)

实 米庆云 宋海常 姜梦弼 (290)

马寅初论抗战时期的金融和经

济建设 王 冲 袁远福(302)

抗战时期西南金融业的发展及

其黄金流向初考 杨安勤(314)

1937年美国第一笔平准基金及

其作用 杨世佐(336)

抗战时期四川物价统制的实施

及其评价 李竹溪(341)

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

国东北铁矿资源的掠夺 刘万东(352)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

北的拓殖移民侵略 李普国(365)

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变动因素

的数量分析(1902—1936) 李宝珠(377)

试论关雒与清代前期四川的商业 鲁子健(394)

略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的性质

姜 铎

近年来，西南财大、四川大学和重庆社科院等单位，集中了一批研究力量，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措施，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初步成果，提出了不少新论点，并连续召开了三次带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对正确评价国民党经济在抗战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十分有益。过去由于“左”倾思潮影响，对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经济，往往一概而论地称之为“官僚资本畸形发展阶段”，对它支持抗战和改变西南、西北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等方面的作用，不是一笔抹杀，便是避而不谈，虽然有失公允，而且也不全面。上述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对过去不公不全面的倾向，有所纠正和扭转。但是否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了呢？譬如，把国民党抗战经济说成了一个早有准备的完整的战略措施，连国民党蒋介石借围堵红军机会，收拾西南军阀势力，也说成是坚持抗战的重要步骤；又譬如，完全否认国民党抗战经济存在与掠夺广大人民和发展官僚资本的一面；等等。因此，我认为有论一下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性质的必要。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整个中国呈现着三个不同性质的经济地区，即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沦陷区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

(其中上海租界存在时期的经济仍属半殖民地性质)，抗日根据地经济属新民主主义性质，这两个地区经济的性质，目前尚未出现争论。对大后方经济，过去一般仍沿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近年来有些论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国民党大后方经济，究竟应属于何种性质？我现在的看法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经济，客观上存在着双重作用，它既是全民抗战中的战时经济体制，对支持抗战和发展西南、西北大后方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又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乘机掠夺广大人民，发展官僚资本，为后来的畸形膨胀奠定基础的阶段。双重作用相互衡量下来，后一种作用逐步占主要地位，因而其基本性质仍应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官僚资本。

我的看法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

一、从国民党战时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来看

在抗战建国的大前提下，国民党战时经济的每一项措施，莫不具有上述双重作用，而其发展的趋势和结果，后一作用又大都占主要地位。

四联总处的设立和强化，纸币发行权由中央银行独占，对私人银行的严格管理等等，是国民党在战时金融体制上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对保证抗战庞大军费的支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沿海富庶地区大部沦丧，政府财源断绝，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则成倍增长，收不抵支，赤字累累，数字有如下表：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岁入岁出和赤字数

1939——1945 (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支出	收入	赤字	赤字百分比
1939	2797	740	2057	73.54
1940	5288	1325	3963	74.95
1941	10003	1310	8693	86.90
1942	24511	5630	18881	77
1943	58816	20403	38413	65.35
1944	171689	38503	133186	77.57

资料来源：根据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30页图表计算。

上表六年的财政赤字累计达205193百万元，每年的赤字高达80%左右，那样庞大的赤字，主要靠发行通货弥补。1945年国民党法币的发行量，已从1937年的16.4亿元增至10319亿元，①增加了近630倍。如果不是国民党政府拥有强大的金融垄断地位，抗战财政的维持该是何等困难？这方面的作用，今天应给予足够的估价。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四大家族利用这一强化了金融垄断地位，大大发展了官僚资本，以及通货膨胀带给大后方整个经济和广大人民的危害，同样情实俱在，不应忽视。

①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16页附表乙(3)。

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是国民党政府经济的另一重大财政措施，对保证抗战后方的军用民食，起了很大作用。但征的粮食数量太大，兹将历年征粮数量列下：

历年田赋三征粮食数量

1941——1944

(单位：市石)

年 份	征 实 量		征购征借量	
	谷	麦	谷	麦
1941	22002760	3162115	24728908	7458573
1942	29022860	5825919	26917413	4409475
1943	28562276	7327290	24469490	4171523
1944	23643887	4904927	23645996	3708723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

四年间征购总数达243962155市石，每年平均6000万市石以上。据调查，1942年在四川省农民负担的征粮数占到每亩稻田收获量的59.5%；在湖南省溪湖十县，占到亩产2.8%；云南也达49%。^①农民收获量的一半或半数以上都被征而去，可见负担之沉重。

对主要物资进行统制，是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的又一大措施。国民党政府在统制钨、锑、锡等矿产和桐油、猪棕和茶叶等出口产品过程中，向苏、美、英等同盟国换回20余

亿美元的军火和物资，对支持抗战和活跃后方经济，无疑是起了不小作用；对国内主要商品，如粮、油、花纱布等的管制、盐、糖、火柴、烟类等的专卖，对保证军需民用，增加抗战财政收入和稳定市场物价，同样起了不小作用，不容一笔抹杀。

问题在于：统制物资单纯以增加财政收入出发，收购价格极不合理，加上通货膨胀影响，调整不及时，远远赶不上成本提高的速度，以致大大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生产厂矿停工关门，农民小生产者抛荒转业，生产萎缩，经济凋蔽的严重后果。

资源委员会收购钨、锑、锡等矿产品的价格，都在市价和成本以下。如湘钨每吨1939年长沙年平均市价2,302.47元（法币，下同），资委会的实际收价1228元，只及市价的53%；1942年以后钨、锑的收购价，一般要低于成本15—50%，钨的收购价更低，1944年3月，云南个旧钨每吨成本50万元，收购价只11万元。在这一不合理收购价格的影响下，这些矿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数量，不断下降。净钨砂以1938年的12556公吨，下降至1944年的3,325公吨；锑从1937年的14,597公吨，下降至1944年的204公吨，纯锡从1940年的15,099公吨，下降至1949年的1,517公吨。各地矿商在无利可图和亏本的情况下，不得不大批停工倒闭，1943年起，钨、锑、锡各矿业由于衰落而进入崩溃阶段，除少数条件较好的厂商勉强维持外，大部分陷于停顿状态。^①

由复兴公司、富华公司（1942年2月与复兴合并）和中

^①黄逸尊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第185页。

^①数字根据资源委员会编《资源委员会沿革》油印本。

国茶叶公司管制经营的桐油、猪棕、茶叶、生丝等出口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压得更低。1940年12月，重庆猪棕每吨生产成本33,400元，收购价21,710元，1944年生产成本668万元，收购价84万元；1941年5月，广西桐油每吨生产成本2356元，收购价1,680元，1943年7月四川桐油每吨生产成本15120元，收购价9156元，①江西婺绿茶叶1939年的平均市价每担94元，收购价36元，1940年平均市价143元，收购价60.34元；②四川生丝1942年每担春茧内需市价54000元，收购价34000元③。除压价而外，这三个公司还存大量苛商扰民之举，如欺行霸市，压价压级、拖欠价款、拖延收购期等等盘剥手段，层出不穷。从事这些农副产品生产的农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与剥削，不得不停止这些商品的生产，废桑园，毁茶苗，伐桐树，货弃于地。桐籽沤粪之类的记载，常见于后方报刊，三个公司的收购计划当然难于完成，出口量大幅度下降，生产奄奄一息。如四川桐油统制前年产50万担，至抗战末期，产量几近于零；又如川、康两地统制前年产生丝两万余担，1944年产量降至两千余担。④

国民党专卖事业，则采取贱买贵卖手段，单纯从增加财政收入着眼，不顾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商品收购价，同样压得很低，而出售价却抬得很高。如1943年4月，食盐专卖机关在四川自流井及资井两盐场的收购价分别为：炭巴盐

每行11167元，炭花盐每行8047元，而同期两种盐的生产成本分别为33956元和27,782元，收购价只及成本的30%左右，而食盐的销售价格，则高至收购价的8倍、10几倍乃至20余倍。①专卖商品的压价收购，同样扼杀了生产，如1943年后方产盐总额为2500余万担，1944年降为1600余万担，1945年更降为1300余万担。②可是国民党专卖所得的利润却十分惊人，仅1944年即获利209亿余元法币，占当年税收总额的38%，③这是对生产者 and 消费者双重掠夺的结果。

作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重点的工矿业建设，则其双重作用更为突出。

抗战前夕，旧中国仅有的基础薄弱的本国近代工矿企业，大部份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大中城市。据实业部调查，1937年全国较有规模的近代企业共计3935家，上海便达1279家，占总数的32.5%，而在西南西北各省的仅有273家，只占总数6%。④抗战爆发，沿海沿江工业集中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通过工厂内迁，扩建，和新建等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战时后方工矿业建设。至1942年为止，西南西北后方工业（不包括矿业）数，已达3758家，其中公营656家，民营3102家，生产资料工业竟达2215家，超过半数，其中水电工业123家，冶炼工业155家，机器制造业682家，化学

①数字根据国民党政府档案资料。

②贸易委员会编《贸易月刊》1942年1—2月号。

③罗承烈：《四川的蚕丝》，《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

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

①参见李建昌：《官僚资本与盐业》。

②《中国盐政实录》4。

③《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及《战时财政金融统计》。

④转引自林德甫：《民营工矿内迁记略》1942年版。

工业826家，完全改善了过去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资本总额1939026085元；工人总数241652人。^①这几年是大后方近代工矿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对供应抗战所需物资和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奠定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以及改变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落后面貌等方面，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系统，在一批爱国实业家和技术专家的主持下，创建了后方的煤矿、钢铁、电力、酒精等动力企业，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建设的基础。有些重要企业还带有开创性，影响深远，如在沙漠荒源上艰苦创业的王门油矿，不仅为旧中国首产石油，提供抗战燃料，还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准备了技术条件。

另一方面，大后方工业建设的发展，又壮大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实力。在抗战前，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寥寥可数，抗战中则一跃而成为大后方的主要力量。在上述工业统计中，公营家数虽只占17.5%，而资本要占69.58%，在主要重工业行业中，公营都占80%左右的比重，在1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公营也占主要比重。也就是说，官僚资本已在大后方工矿企业中初步形成了垄断地位，并为下一阶段的畸形膨胀准备了基础。下一阶段资源委员会工矿企业的畸形膨胀，固然是建立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基础上，就连宋子文、宋云章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也是凭借着这一阶段经营雍兴实业公司的基础。这个雍兴公司，是中国银行全额投资，成立于1940年，资本2,000万元，辖有18个企业，涉及纺织、面粉、机械、皮革、制药、食品、印刷、煤炭、

火柴等部门，中心是纺织业。该公司1942年拥有纱锭10万余枚，占后方纱锭总数32万枚的1/3，1942、1943年的棉纱产量，均占后方纱产量近40%，是西北地区的主要工业垄断机构，主持其事的便是宋子文和宋云章。

二、从国民党战时经济与民族资本的关系来看

国民党战时经济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关系，同样存在双重作用，即一方面倡导和扶持，另一方面又排挤和压抑。

开头几年，前一方面作用大些。600多家民族资本厂矿的内迁，国民党政府是尽了倡导和扶持责任的。在低利贷款，原料供应，成品收购，军需加工等方面，国民党政府也给予民族资本种种便利。这几年后方民族资本工商业有一个较大发展，同国民党政府的倡导和扶持是分不开的。

后来几年，随着官僚资本实力的逐步壮大，经济统制的日益强化，国民党政府便与民争利，对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排挤和压抑多了起来。1942年以后民族资本从发展高峰转向衰落，虽然存在种种主客观因素，但同国民党的排挤和压抑，显然也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政府对后方民族资本纱厂逐步加强花纱布管制的过程，颇能说明两者间关系的演变。纱布是后方军需民用的必需品，市价不断上升，民营纱厂有利可图，开头几年均赚了一笔钱，军需单位虽对纱布限价征购，但数量不大，各厂产品大部自销，棉花亦可自由收购，原料不成问题。1942年春，经济部成立物资局，下轄原设之农本局，专掌战时国内

^①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

花纱布管制事宜，派员驻厂监督，各纱厂所出之纱，全部由物资局统一收购。而收购价远远跟不上成本提高的速度，如1942年9月，每件20支纱收购价只5300元，当时陕棉每担价已2000余元，每件纱用棉按5担计，仅原棉成本已超过万元。各厂赔累过巨，一致发出呼吁：“既无挹注之可能，只有待毙之一法，”^①不断向国民党抗争加价，并通过报刊、参政会等渠道，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双方关系搞得很紧张。1943年春，经济部物资局抑销，农木局改组为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这个局不仅统制了纱布，连棉花也进一步统购，实行“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一整套统制政策，各纱厂所用棉花，亦由该局供给，已无营业可言，仅代政府纺纱织布，取得勉强维持生产之工钱，根本无利可图了。

说实在的，在国民党宣布抗战建国方针，开展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大前提下，当时不少抗战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曾一度对国民党政府寄予颇大希望，积极响应和参与政府领导的经济建设事业，希望获得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历史的遗憾是：在战事与腐建，大失所望。

事例之一是华西实业公司的被孔祥熙兼并。这个公司是民族资本实业家胡仲实、胡叔潜弟兄于1942年在重庆创办，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下辖华西钢铁厂、华联炼铜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棕厂等工厂，以及铁矿、煤矿和耐火材料矿，并设有一个华西建筑工程部，承包了一批重要建筑工程，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名噪西南。华西原来是依靠四川军阀刘湘为后台，抗战

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主持华西的胡氏弟兄和公司常务董事宁芷村、经理胡子昂商量结果，便把发展华西事业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的“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政策，主动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扩建华联钢铁厂，发展后方钢铁事业。结果被孔祥熙看中了，定下兼并华西的图谋，提出投资合办方案。华西资方先不肯轻易放弃经营主权，只申请贷款，不接受合办。后在孔祥熙的压力和劝诱下，才同意由政府投资合办，改组为中国兴业公司。第一次合资1200万元，官股达977万元，已占资本总额的81%强；第二次又增资为6000万元，官股增达5331万元，占总额的89%；第三次更增资为12000万元，官股占了总额的95%，私股只剩下5%，公司经营管理大权，由孔祥熙一手控制，孔自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也由孔的亲信傅沐波担任，原有资方只安排了有名无实的闲职。这个公司打着官商合办发展钢铁工业的招牌，获得国民党政府上10亿元的优惠贷款，但在孔祥熙、傅沐波官僚腐败统治下，内部机构膨胀，贪污盛行，效率低下，生产营业并无大的发展。后在四大家族内讧风波中，傅沐波于1944年1月被迫下台，由胡子昂接替缓冲，维持至1945年11月，宋子文无心经营，即以一部公文，通知中兴公司停业清理。

事例之二是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同官僚资本合作办厂的经过。刘鸿生出于抗战爱国热情，决心从香港回到重庆，主办中国毛纺织公司和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企业。这两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部很有成绩，但缺乏流动资金，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长资，投资条件十分苛刻。当孔熙允刘鸿生借款接济

^①1942年9月裕华、裕丰、申新三厂联合呈经济部物资局函。

^②参见宁芷村：《中国兴业公司剖视》，《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

中国毛纺织公司时，竟付了以下四个条件：（一）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将由财政部处理；（二）开工后若产品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集团有优先投资权；（三）董事长由官僚资本集团的代表 宋子良担任；（四）刘鸿生担任总经理，副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代表担任，兼掌握财政权。刘鸿生不得不答应下来，这个公司成立后，控制权完全落入官僚资本手里。中国火柴原料公司创办资本200万元，财政部认了100万，官商各半，后在增资过程中，官股势力不断增大，刘家股权日益缩小，又是代表官僚资本势力的宋子良担任董事长，操纵了董事会的实权。这两个公司都赚了多少钱。中国火柴原料公司1942至1945年四年间的盈余总数达1.87亿元。同一期间，中国毛纺织公司盈余总数更达3.90万余元。这笔盈余，却大部分上了官僚资本家的腰包。还是刘鸿生先生自己说得好：“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了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①

事例之三是国民党当局企图吃掉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抗战前夕，卢作孚主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已统一了川江的航运事业，成为千里川江的唯一近代航运力量。抗战开始，民生公司从各方面积极支援抗战，武汉沦陷前后，沿江撤退的公私物资堆积如山，主要靠该公司全力抢运。当时国

军政部长何应钦说明，民生公司有能力完成抢运任务，只要给予一定运费；如果强迫全部船只无偿打差，引起公司破产，必受舆论谴责，对各方面不利。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杨森等人，又都支持民生公司，国民党当局权衡利害，只好同意改差运为託运，民生公司才没有被吃掉。^②

这些事例，说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待民族资本，排挤、压抑甚至兼并，要多于倡导和扶持，国民党战时经济建设的目的，既为了抗战，又为了发展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走的不是一条道。这就不能不促使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对国民党逐步丧失了信心。

三、从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政治演变来看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和政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是为它的政治体制服务的，研究国民党经济问题，不能脱离政治而就经济论经济。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处在一个政治演变的过程，“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日战争，国民党被迫接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执行过去的十年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的反动政策，共同抗战，共赴国难，这是国民党政治上的一大转变。在抗战开始时期，国民党军事上积极抗战，政治上开始了一些民主许诺和措施，如召开参政会等等，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承认，是国民党政府政

^①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

^②参见官商闻：《著名实业家卢作孚》，《重庆工商史料》第三辑。

民党当局竟企图借此机会，以统一调配便利军费运输为名，强迫民生公司把全部船只交军政部统一掌管，一举吃掉民生公司。卢作孚一方面坚决顶住，另方面托政学系张公权，向治威信最高的年代。遗憾的是，国民党政治上这一转变，步子很慢，很不得底，军事上停留在片面抗战，不肯实行全面抗战，政治上拒绝改变一党专政，不肯实行民主开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未能有根本性的变化。武汉撤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接受了日本的招降，脱离抗战阵营，甘心当汉奸傀儡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虽能续留在抗战阵营，但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比抗战初期倒退了。这一反动政策，拖拖拉拉，反反复复，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始终未有大的转机。如果说国民党当局这几年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值得自夸的话，那就是：第一没有向日本人投降，第二没有同共产党最后分裂，如此而已。

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必然影响到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抗战建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大大削弱，而利用权势，投机囤积，发国难财，掠夺广大人民，发展官资本，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一面，则大大加强。其结果就造成了大后方出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国民党这一个大苹果，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这里的总根源和根本问题，是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反动政治体制在作怪，绝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是经济政策执行上的一般缺点问题。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 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

孔经纬

首先，要从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体现的社会发展阶段性谈起。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期，并非属于崩溃阶段，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末尾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本身仍然有其存在与某种发展的余地，同时还有殖民地和殖民地经济的存在与某种扩展。局部地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代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成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并存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本身并未因此而陷于土崩瓦解。历史上一个社会被另一个社会所代替，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倒是显得经济上的作用突出些；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一方面要从统治者身上找经济上的原因，另一方面要从被统治者革命力量壮大程度上去寻根问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者之被推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而实现的。

其次，要对深入研究国统区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和传统利

制规律在国民党统治者身上的体现有个明确认识。国统区经济史尚缺乏专门研究,还没有看到独立成书的类似读物。人们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与研究中虽然都毫无例外地牵涉到了这方面内容,但距离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如实地揭开本来历史面目甚远。关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具体历史作用,有待于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做出新的科学总结。这种研究工作,无疑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对于研究国民党史和蒋王朝实现统治的历史规律,对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史,均具有莫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共有规律。一切统治者、剥削者从其切身利益关系出发,为了实现剥削与统治都无例外地要在不同程度上容许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一些发展,这也不是它们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历代王朝都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也一样,无论是清王朝,还是旧军阀,直到国民党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剥削规律。在这一点上,不能说国民党统治者例外。我们接触了一些第一手档案资料和其他方面资料,已经初步证实:国民党统治者在十年内战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或多或少的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政策,当然主流是一种反动统治。对有些情况不应该一概否定,如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提出了二、五减租并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某种举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者在后方搞了某种扶植自耕农的试点工作,国民党统治者在抗战后还有过免赋免租的举动。国统区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解剖,只有这样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

有了对大阶段情况的正确认识,才能进一步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后方经济做出恰当分析。当前对如下一些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争论问题不能夹有感情用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差之毫厘便会谬之千里。人家要一概否定,你就来个一概肯定,这是要出大毛病的。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经济,既要有肯定又要有否定。对一个事物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这并不矛盾。

要全面占有资料,不能只收集能为自己的论点服务的资料,须兼收正反两个方面的资料,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看哪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哪些是既有进步性又有反动性。既不能只抓住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的进步方面,也不能只抓住其反动方面。

不能割断历史,要联系起来进行观察。抗战时期的前面和后面都不管,只对中间的一段来个硬拔高,又说不出当时是怎样变过来的和后来又是怎样变回去的,致使立论无法立足。如果真的要想坚持自己的主张,就必须正面说明抗战后是怎样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抗战结束后又怎样由一个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政权的阶级属性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不可能只做坏事而不做好事,特别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多做好事。但政权性质不可能仅仅因为某种外来势力武装入侵而自然而然地发生

变革，只能是带有更多的进步色彩。当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位的时候，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有所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倒是事实。至于资产阶级愿意把自己的政府说成是人民的或国民的政府，这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法西斯政府也曾经打着国民政府的旗号。我认为，对抗战时期的蒋政权仍应称之为国民党政府。

不能这样说：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政策只有进步性，如果说有弊端那是执行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政策是好的，执行中有缺点。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措施，其本身即含有两个方面：既有进步性又有掠夺性。即以田赋征实而论，一方面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为适应抗战需要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统治者在抗战条件下实现剥削和掠夺的必要手段。

回避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经济，不能避而不谈外国经济势力、封建地主经济、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以及工农大众的状况，不能抽掉阶级关系而只一般谈论经济发展。不能把剥削者、统治者实现统治与剥削，同社会经济发展绝对地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往往是统一的。有人怕否定官僚资本的某种进步性，而否认官僚资本的存在，这是没有必要的。官僚资本是一种客观存在，特征是主要靠特权实现剥削，其垄断性在初期、中期、后期有程度上的不同。

不要单纯地就事论事，应该有所对比，通过对比会使问题进一步明朗化。具体说，就是要把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经济拿来和沦陷区殖民地经济（关内与东北）做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与相同点；同时也要把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经济

拿来与解放区经济做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这一方面是问题研究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出现片面性估价的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 在经济上的战略调整

韩渝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机,建立由国民党政权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对经济方针政策和经济机构作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不仅关系到战时整个国统区经济的发展,甚至关系到国民党抗战的成败。弄清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了解国民党战时经济方针和经济机构的基本框架,也是进一步研究战时国统区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方针及政策的调整

战时经济方针政策的调整,既与战前有继承关系,也有从平时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明显发展过程。

国民党南京政府自1927年4月成立以来,就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招牌装扮门面,但这却也使国民党的政纲国策承袭了孙中山的一些思想因素。这对国民党政府战前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孙中山强调发达国家资本,主张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国民党政府借此加强了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控制。最突出的表现是通过币制改革,

白银国有,设立官办银行和加股改造私人银行等方式,以通过对金融的垄断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并且也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等机构建立了一批国营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国家资本。这些就为战时经济转轨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机械地将孙中山制订的《实业计划》作为经济建设的万灵方针,不能根据实际形势作出调整,就影响到国民党政府不能及时从反侵略战争的角度来改变旧中国生产力的畸形布局 and 不能预先开发战略后方基地——西南地区。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利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沉缅于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对外实行妥协投降方针,缺乏对日抗战的思想准备;加之国家资本的缺乏,国民教育的落后,人口的压力,封建因素的阻碍,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无能。这一切形成恶性循环,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使得国民党政府在战前不能集中国力进行国防建设。

在制定基本方针政策方面,不断法西斯独裁化的国民党政权也热衷于加强控制国民经济。如在1934年12月提出了对产业和外贸“励行统制及保护政策”的主张,曾实行过对蚕丝业和棉业的统制。^①华北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威胁日益加剧的局势下,国民党政府又再次提出“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活动,使国民经济得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的主张。^②同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羡慕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所表现出的对国民经济的严格控

^{①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二分册,第117页、第373页。

制，并将其与法西斯德国通过计划实行统制经济混为一谈。

蒋介石认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分配、交易、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相互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在此政策之下，全国人力与资源，得不分界域，为全盘适当之配置，以发挥最大之效率；生产之结果，得共同利用，为公平适当之分配，以提高大家之福利。”正在因为出于这种认识，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就特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领导实行“计划经济”^①。1937年2月，又再次重申实行计划经济^②。上述方针，尽管理论混乱。在战前也并未有效实施，但都为战时经济调整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沿海沿江地区尽陷敌手。国民党统治区立即陷入了经济混乱和国境之中。战事的发展也形成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经济压力。“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几天，军政部就报告弹药库存只够20个师战斗三个月，粮秣只够50万人，10万匹马过一个半月。^③要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长期作战战略来进行抗战，就必须保证军火军需品的供给。当时军火3/4靠进口，而海口全被日军封锁。同时难民大量涌向后方，国民党军政中心也撤向内地，加重了后方社会经济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开发重建后方经济，发展战时生产，保证前线和后方的需要，维持后方社会经济的稳定，紧迫的形势使国民党政府必

须迅速提出战时经济方案。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1937年月8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国军事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等纲领。^④这既对国民党政府是一种有力的督促，又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所以，国民党政府一面采取紧急调整措施，在军事委员会属下组成新的军事化的经济机构，动员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初步管制金融外汇，处理紧急经济事务，决定迁都重庆，作出了在西南重建工业中心的重要决策。同时积极谋划如何在政府领导下重建战时经济。尽管最高当局要全力应付激烈的战事，但也在进行徐州大战的同时，于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党政府战时“施政的根本方针”。关于经济，作出如下规定：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税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

^① ②③《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二分册，第295页，第175页，第294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7年第二期，第4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8页。